

第一章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 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它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特点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母体中，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工商业城镇和市场的大批涌现，自然经济的日趋解体，冲击着封建经济的根基。特别是从明代中叶起到鸦片战争，在中国手工业生产中，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还无力摧毁封建主义，但“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当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正处在迅速发展阶段。清王朝为了确保自己的封建统治，便实行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这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相矛盾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越出国界，寻求广大市场。因此，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把封建落后的中国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倾销廉价商品的主要基地。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社会失去了正常发展的机会，一步步地向着半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页。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

首先，“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場。”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把棉纱、棉布、煤油及其它各种廉价工业品大量推销于中国，同时又从中国廉价掠取茶丝、棉花、牛皮、大豆等各种原料和特产。通过搜刮原料和推销商品，外国资本的势力逐步遍及于各口岸，城市以及内地广大乡村。使得原来不需要依赖市场的个体农民，转而必须依靠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同时生产部分为了交换的农产品，变成了小商品生产者。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狭小的地方市场扩大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并逐渐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及附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个市场，虽然为外国侵略者所占有，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占领市场的缝隙中，也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劳动力的市場。”外国廉价商品在中国的倾销，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竞争不过机器工业。“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洋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②“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③这些破产的、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为了生活，便不得不出卖自己仅有的劳动力，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劳动力市場。

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财富的积累也随之增长。除了封建政府利用国家权利，征收田赋、盐税、厘金、茶税及其它苛捐杂税，对人民进行超经济掠夺外，封建地主、大官僚地主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9页。

②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5页、233页。

通过对农民提高正租率和增收附加租的剥削，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一些官商、行商和银号、钱庄的经营者，通过贱买贵卖、侵占、欺诈等手段，攫取了一定的货币财富；直接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的买办，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利益中分得相当数量的财富；在美国、日本、南洋等地经商的华侨，早已有致富者。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的人，在外资的刺激下，对资本主义生财之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将手中的货币财富部分地投资兴办近代工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就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受到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严重威胁之后，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官僚，积极兴办军事工业。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以强化和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以1861年曾国藩开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至90年代，共设立大小军事工业19个，雇佣工人约1—1.3万人，花费国库经费4.5千万两左右。其中较大的企业有：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通商大臣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189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创办了湖北枪炮厂等。这些军事工业，是由清政府封建官僚所控制的官营工业，资金来源于国库。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和利润，而是为了直接武装封建军队。企业管理也是沿袭封建衙门的一套规章制度，所以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是，这些企业普遍使用机器生产；采用雇佣劳动；生产也受价值规律的作用。从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近代军事工业。它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对西学的传播和科技人才的培养都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从19世纪70年代起，以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了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供应、减轻财政困难和牟取高

利，打起“求富”的旗号，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以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为起点，到90年代中期，这类企业有20多个，资本达1.7千万两。主要是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采煤、炼铁业，和为解决财政经费的贵金属开采以及利润丰富的棉纺织业。其中规模较大的企业有：1875年开办的台湾基隆煤矿，1878年兴办的开平煤矿，1888年开办的漠河金矿，1890年兴办的汉阳铁厂，189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兰州机器织呢局、湖北织布局、华新纺织新局、湖北缫丝局等。这些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又不尽相同，资本的所有者多数是以私人投资为主；企业生产的产品全属商品生产，计划出售，并有明确的利润目的；工人自由招雇等等。因此，这些企业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虽然仍带有明显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阻碍着当时正在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他们毕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工业，它们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训练了一批掌握近代生产技术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办了一批洋务学堂，首次派遣了出国留学学生等等。这在客观上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开始出现，当时仅有20家左右。80年代逐渐增加，约有50多家，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到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企业共创办136家，资本达500万两，雇工近3万人。民族资本企业主要是缫丝、轧花、棉纺织、面粉、火柴、造纸、印刷、采煤、金属开采、船舶修造、公用事业等。

缫丝业：1872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到90年代广州及其附近机器缫丝厂发展到50多家，成为发展民族资本缫丝机器工业的一大中心。1882年上海出现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到90年代出现7家，成为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另一个中心。

轧花业：1875年在江苏设立程恒昌轧花厂，1887年在宁波设立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此后在上海建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和礼和永轧花厂，每厂有轧花机数10至100余台。

棉纺织业：90年代在上海建立了华新纺织新局、上海裕源纱厂，在宁波建立通久源纱厂。此外，在天津、镇江、广州、重庆、扬州、广州都曾有本地绅商酝酿兴办纺纱厂。

面粉业：1878年在天津创办了贻来机器磨坊，1887年设立福州面粉厂，在上海开办了源昌机器碾米厂等。

火柴制造业：从1879年至1900年，先后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浙江、太原等地都设立了火柴厂。其中上海的燮昌火柴公司、天津自来火公司、重庆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等，规模较大，雇佣工人各约数百人。

造纸、印刷业：1889年广州设立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1891年上海设立伦章造纸厂。甲午战前，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设立新式印刷厂10余家。其中，1882年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局规模较大。

采煤业：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后在安徽池州、湖北荆门、山东峰县枣庄、广西富川贺县、直隶临城等地筹办煤矿。其规模，资本少则2~3万两，多则20~30万两。此后又建9个煤矿企业。这些煤矿由于资金不足，技术落后，有的仅能勉强维持，有的开办不久即行停闭。

金属开采业：1881年至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开办金矿、银矿、铜矿、铝矿等14个企业。规模最大的是1883年开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投资总额达80万两。

船舶修造和机器制造业：甲午战前，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在上海一地设立了10多家企业。其中，船舶修造业达9家。这些企业规模都不大，资本最多达500元左右，少至100元。大部分企业只能从事修理业务，只有少数几家能够进行某些机器的制造。

此外，在制茶、制糖、制药、轧铜、制玻璃、制煤饼、制汽

水、碾米等方面，也产生一些民族资本企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不是在手工工场的基础上产生。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一般要经过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大机器工业几个阶段。手工工场的充分发展是大机器工业产生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没有发展到手工工场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出现的机器工业，不是从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发展过来的，而是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的，由于手工工场发展不成熟，所以近代民族工业一出现，就缺乏自身发展的基础。

第二，民族资本经营近代工业主要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开始的。这一时期，民族资本经营的缫丝、棉纺织业、火柴制造业、新式印刷业等，大部分获得成功。因为这种工业不仅有市场，而且投资少、设备简单，企业建设时间短，资本周转快，容易获得较高的利润。而采矿业，则大都失败，因它需要较多的资本，较复杂的先进技术和较高的组织能力与经营能力。当时民族资本缺乏这些条件，特别是原始积累不充分，资金短绌。他们大都只能凑集较少的资本，购置少量的机器，进行小规模的开发；加以运输困难，经营不善，以及地方封建官僚不予支持甚至阻拦，其结果只有失败。

第三，大部分企业投资少，规模小。企业资本多者10万两以上，少的只有几万两甚至几千两。大的缫丝厂资本达20万两，个别煤矿资本达20~30万两，只有山东平度招远金矿投资高达80万两。100多个企业总资本共计500多万元，平均资本不过4万元。这种状况，不仅不能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相比，而且比洋务官僚资本企业也小得多。由于民族资本资金不足，再加上受外资排挤打击，受官僚资本束缚，十分惧怕亏损失败，因而企业经营方式，绝大部分采取集股经营，独资经营则很少。这样，企业资本少，规模小，企业内设备简陋，生产效率低，资金周转困

难，生产成本低，产品无法与进口洋货相竞争。

第四，近代民资工业产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地的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地区。它便利原料出口和加工，也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土产原料的需要。它反映了民族资本，一产生就带有半殖民地性质。

上述特点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它代表一种新的先进生产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和特征

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逐渐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比商品输出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使城乡手工业和小农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商品经济得到较多发展，从而为民族工业提供比战前较广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以上海市人口为例，甲午战前 1890 年有 168,129 人，而甲午战后的 1910 年激增到 1,185,859 人，20 年增加 6 倍。^①除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是江浙一带破产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这就出现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然，这种扩大了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首先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但是在这种扩大了的商品市场中，在帝国主义占领的空隙里，也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甲午战后，清政府财政枯竭，洋务企业连年亏损，已无力继续垄断新式企业。这就迫使清政府减轻和放松了对民族资本工业的限制，曾采取一些“补救之道”，如对创办新式工业提倡奖励政策；设立商部，颁布商律等，其目的虽是维护自身的统治，但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40 页。

在客观上给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环境。

1895年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社会各界强烈要求“设厂自救”、“抵制洋商纱厂”，“不买外国货”等。使帝国主义商品输华锐减，而民族工业产品“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

甲午战后，在上述有利时机和条件下，从1896~1898年，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中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缫丝业发展比较突出。纺织业：1895年~1898年中，共新建纱厂9家，布染厂9家，纺织厂16家，平均资本为50万元。在上海、无锡、南通等地集中纺织业达56.8%。如在苏、沪、杭地区除原有的华盛、裕源、大纯等厂外，新建和投产的纺织厂又有：宁波的通久源（1896年）、无锡的业勤（1897年）、苏州的苏纶（1897年）、杭州的通益公（1897年）、上海的裕通（1898年）、南通的大生（1899年）和肖山的通惠公，其产品十分畅销。缫丝业也颇为景气，1896~1898年，全国共建29家机器缫丝厂，计有资本324万余元。其中在广东顺德地区设有21家，共有资本52万元，平均每家资本2.5万元；在上海设有2家，共有资本104万余元，平均每家为52万元；在杭州设有2家，共有资本50万元，平均每家75万元；在苏州设有4家，共有资本117万元，平均每家29万元。上述统计中，广东地区丝厂数量虽多，但各厂资本力量单薄。新设各厂中资本最多的不过3~4万元。而苏、沪、杭地区，新设丝厂虽仅8家，但拥有资本较为雄厚。如上海祥兴、永泰二厂，各拥资本42万和62万元；杭州的世经缫丝厂，拥有资本42万元，其设备都达到英商怡和丝厂的水平，是长江以南新设厂的一个规模宏大的丝厂。因此，甲午战后，江南缫丝业逐渐取代广州地区，而跃居全国缫丝业的中心地区。正如当时人们指出那样：“上海等地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厂接踵添

没，络绎不绝。”此外，轻工业中的面粉业、火柴业、烟草业、酿酒、印刷、造纸、榨油、肥皂、碾米、制革、制麻等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如经营比较好的有：1895年山东烟台成立的张裕酿酒公司，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等。重工业的机器制造业、矿冶业、水电业、建筑材料业也在缓慢地发展。

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力量仍然非常薄弱，成长十分缓慢。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依靠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对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这就给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从投资数量上看，帝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取得在中国开办工厂特权后，投资数由甲午战前2~3亿美元，增加到22亿美元，增加9倍。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规模较大，资力雄厚，而华人厂矿则一般规模较小，资力薄弱。外厂平均每家资本额为81.8万元，而华人企业平均每家资本额为19.4万元。^②在资本分配上，外厂资本额大的占多数，资本额小的占少数；华厂资本额小的厂矿占多数，资本额大的占少数。如资本额在1至10万元之间的厂矿，华厂与外厂各占其总厂矿数的比例为：华厂占55.2%，外厂只占5.1%；资本额在10~50万元之间，华厂占其总厂矿数的34.5%，外厂占其总厂矿数61.8%；资本额在50万元以上者，华厂只占10.3%，而外厂则占33.1%。^③民族资本企业与外资企业资本力量相差悬殊。无法与其竞争，必然受其排挤。在商品市场上，外国资本除了向中国输出本国产品外，又加上倾销在华生产的产品，使民族工业承受双重压力。仅以棉纱市场为例，1891-1893年间，洋纱输入量为70万公担，大量进口洋纱再加上外国在华纱

① 《关册》，1897年（中文本），总论第1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89页，表2。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399~401页，表2。

厂所生产的棉纱，在中国市场已占居绝对优势。此外，民族工业的市场价格也处于劣势地位，华纱产品成本高，无力与洋纱竞争。再加上中国民族工业还要受外国银行的控制，外国银行一旦压缩金融，便直接影响民族工业。民族工业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强大经济压迫，许多企业因竞争不过而倒闭，或被外资企业吞并。至于一些小手工工场，更无力与外资厂商相抗衡。

同时，中国民族工业还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清政府对工商业征收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在苛捐杂税中对民族工业危害最大的是厘金。甲午战后，清政府由于赔款，财政支出大增，除对人民大肆搜刮外，厘金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1894~1902年的厘金收入都在1400余万两到1600余万两之间。这样，民族工业产品价格就不纳厘金的外商产品价格高，实际削弱了与洋货竞争力。对此，民族资本家张謇曾致书张之洞说：外“不受厘之害，转可以厘害我之商，我国商货无一足与外商竞争。”“外商货物成本皆轻，足以制内商之死命而有余矣。”^①可见厘金危害之深。同时，民族工业还受封建经济关系的阻碍。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虽然封建自然经济继续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关系仍十分严重。其中，高额借贷利率长期存在，最低利率为6%，最高达36%，如果投资工业的利润不能超过或者达到商业高利贷的利息收入，很难使商业高利贷投到工业上去。这样，高利贷统治着资本市场，工业资本筹措困难，资本短缺，势必影响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民族工业一般规模比较小，资力薄弱，资金缺乏，因而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靠外国资本借贷。还有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吸收了外国资本股份，或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或向外国当局注册，挂外国招牌；或者拉进外人当股东，聘请外国

张謇：《拟请提议照约速定裁厘加税清秘密会议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册2，卷3，第33-34页。

人当荣誉董事长。民族资本还需外国资本提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许多企业往往是一面购买“洋机”，一面雇佣随机“洋匠”。中国民族企业与封建势力也存在较多的联系。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投资办厂的人，绝大部分是封建官僚、士绅、地主和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商人。这些人，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成为资本家后，不可能割断与封建势力的联系。他们一面投资经营新式企业，一面又在农村拥有土地，进行封建剥削，或高利贷剥削。还有许多民族资本家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往往主动依靠封建势力，它需要政府的批准和有势力官僚的支持，需要地方政府保护企业、管束和镇压工人，需要获取减免厘税的特权，需要政府保证一定的销售市场和资本的支援。至于得不到封建势力支持的企业，往往归于失败。

由上可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受外资排挤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具有一定程度反帝反封建和发展经济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具有它的软弱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性又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所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程度上又与外资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与坚定性。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

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诞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兴的社会阶级。

19世纪7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一些买办、商人、官僚、地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来源。据1872年至1913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资本开办的25家纱厂，在41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26

人,商人 5 人,买办 10 人;面粉工业, 1895~1913 年,中国资本家开办的 28 家面粉厂,在 43 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 11 人,商人 15 人,买办 15 人,另有华侨 2 人;轮船航运业, 1872~1913 年,中国资本开办的 12 家轮船公司,在 15 个创办人中,有地主和官僚 9 人,商人 2 人,买办 4 人。另外,毛纺、缫丝、榨油、卷烟、水电、水泥、煤矿等 7 个行业, 1872~1913 年开办的 80 家近代企业,在 103 个创办人中,有地主官僚 67 人,占 65.1%;商人 15 人,占 14.5%;买办 21 人,占 20.4%。^①又据, 1904~1914 年 10 年间在上海设立的 37 家规模较大的华商工厂的主要创办人的出身调查,其中官僚 8 家,买办和洋行高级职员 7 家,地主、商人 8 家,银行家和钱庄老板 4 家,华侨 3 家,其他一般职员和手工业者 7 家。由官僚、买办、地主、商人等创办的企业即占 90% 以上。^②从上述材料,可看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办人和主要投资者,即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转化而来的。

洋务派官僚在创办近代工业过程中,不断发生分化,是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又一重要来源。一部分洋务派官僚目睹“官督商办”企业负债、亏损、倒闭而告终的事实,从而产生独立投资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愿望。这部分人大致有几种情形:一是洋务派官僚通过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积累了对新式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在洋务运动破产后,独立投资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如杨宗濂、杨宗瀚二兄弟于 1890 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因工厂被烧,由 1895 年他们又把积累财富的一部分投资开办无锡业勤纱厂。二是,洋务派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官督商办”企业的股份投资逐渐增多,从而把“官督商办”企业变成独资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洋务派官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 23—24 页。

② 何干之:《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第 13 页。

僚也随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如曾国藩女婿聂缉槩，1890年筹办“官督商办”的华新纺织新局，此后他用贪污所得陆续投资，终于掌握了该企业的1/10股权，1908年他将企业收买，并改组为恒丰纺织新局，开始独立经营。三是，一些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官僚，在洋务派头目的扶持和优厚待遇下，投资兴办民族资本企业，并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述洋务派官僚、买办和商人通过“官督商办”企业作杠杆，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19世纪80~9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侵略者在华兴办企业的增多，国内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新式机器不断地输入，城市传统手工业的一些部门，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中一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也随之发展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一些长期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的行业，由手工业者和学徒工转化为手工工场主，再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较多。如在木器工业中，资本家大都是工匠出身；在皮革工业中，有2/3的资本家是工匠出身；在机械工业中，1913年上海91家机器厂的创办人中，手工业者或学徒出身的占80.2%。但是，他们一般资本很小，如1913年上海机械工业中，这些人开设的73家机器厂的资本加起来，还比一家买办开设的机器厂的资本小1/3。

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由上述几种人组成。但是，在它兴起阶段，早期官僚资本占压倒优势。据1872~1894年间72家本国企业资本额统计，官督商办企业占77.6%，而商办企业仅占22.4%。商办企业数量虽较多，但其全部资本额的总和，还不如轮船招商局一家最多年份的资本（1882~1883年资本计530余万两）多，平均每家只有8.8万多元。官督商办企业数量较少，但平均每家资本为85.3万余元。相比较，民族资本如此薄弱，就无法为其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民族资本产生时期，向商办近代企业投资的人们大多数正处

于陆续从母体里分化出来，还未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的状态，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的。

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与兴起阶段相比，民族资本经济有了显著的增长，并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中占据优势地位。据1895~1913年间商办和官督商办两种企业的资本额比较，官僚资本的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的资本额，由初期的77.6%下降到23.7%；民族资本的商办企业的资本额，由初期的22.4%上升到76.3%，其资本额增长数量约相当于前一阶段的20倍。^①民族资本由劣势转到优势，远远胜于兴起阶段，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应有的物质基础。同时，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除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继续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外，有许多人通过雇佣剥削的积累，获取经营企业利润，跻入资本家的行列，独资创办一个或几个企业。一些新式商人和其他剥削者，如经营鸦片、洋纱布、煤油、卷烟等商号的老板；从事房地产买卖和金融业的投机商等；因走私漏税，屯积居奇、买空卖空、投机取巧而暴富的人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因投资于新式工矿业而成为工业资本家。此外，一些小业主和小生产者，通过逐步扩大雇佣剥削的积累而上升为资本家；许多华侨富商纷纷向国内投资办企业。上述形形色色的人们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使得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初具规模。在这支队伍中，已形成拥资百万元至数百万元的大资本家。他们一般是从官僚、买办转化而来，主要凭仗自身兼有的封建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联系，或从外国殖民主义者获得某些特权，而得到一定期间一定程度上的积累资本的便利条件，通过扩大经营和兼并的方式，逐渐占有若干行业不同的企业。以张謇、祝大春等14个大资本家创办或参加

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各表累计。

投资企业为例，他们共有企业136家，多者27家，少者3家。在所办的企业中，1895年以前设立4家，1895~1900年设立23家，而1900年以后109家。他们是占有企业较多较大、社会地位较高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一批批地涌现，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代表着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跃上政治舞台的。

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亲疏关系和转化程度的差异，又可以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较为密切，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资本也较雄厚，大都是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和某些华侨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他们本身即是官、绅、商三位一体，受到政府的庇护，有专利权、垄断权。因此他们从事的政治、经济活动，对社会影响也较大。为了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希望清政府实行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他们是清末维新派和立宪派企图跻身政权的社会基础。而华侨中的上层则是保皇会的社会支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妥协性十分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是由手工业工场主或中小商人转化为资本家的。他们兴办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少，资金不足，力量薄弱。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较为疏远，而且往往受外资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打击和压制，时常有破产的危险。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到20世纪初，才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他们蕴藏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基础；华侨中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是革命派的主要支柱，革命派则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者。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存在明显的二重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又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第二节 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初步传播

一、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提出

19世纪70~9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他们以最先觉悟者的姿态，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体来源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如容闳、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到过外国，或生活在香港，与外国人有较多的联系，长期接受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二是从封建士大夫队伍中分化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如汤震、陈虬、宋衡、宋育仁、陈炽等。这些人从小接受封建教育，虽然没有去过外国，但他们通过书刊或别的方式，间接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现状表示不满，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要求。三是，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官僚、买办，如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及郑观应等人。他们原是洋务派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是洋务派头子的门下幕僚，参加了洋务派的商务、政务、外交等活动。后来对洋务运动产生怀疑，提出了不同见解，并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上述知识分子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容闳的《西学东游记》，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尺牍》、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和《曾论书后》，汤震的《危言》，陈虬的《治平通议》，宋衡的《卑议》，宋育仁的《时务论》，陈炽的《庸书》，郭嵩焘的《养知书屋遗集》，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等。他通过著书立说，程

度不同地吸取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营养，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念。

首先，他们冲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要求学习“西学”，“西法”。为了排除学习“西学”的障碍，他们对封建复古思想做了一定的批判。认为只有打破旧的传统成见的束缚，才能学习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他们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撇开了西学的精髓，“西学为用”是“遗其体”，是丢掉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这个根本。批评洋务派“全盘西化”的主张，是跟着洋人的屁股后面踟蹰而行。按照这种做法，即使达到了“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一切仰仗外洋，自己没有自主力。他们认为正确的作法是全面学习，变通为用。

其次，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最初他们认为西方的富强在于船坚炮利优于中国，但与西方有了较多的接触之后，又逐步认识到西方国家富强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且在于振兴商务，认为商务足以富民，中国应当振兴商务以达富强。陈炽说：“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薛福成说：“握四民之纲者，商也。”“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哉？”^①他们认为“富民”、“富国”的方策根本在于兴商。中国如果象西方那样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富强起来。郑观应则进一步提出了“商战固本”的救国方案。认为，国强是以民富为基础的，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后来又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采取“兵战”与“商战”两种形式，即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交相为用。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他们“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国”。因此，提出对付帝国主义要兵战与商战并举，以商战为主，以商战固国本，国本强了，帝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录》第2卷，第1页。